

全国第一二届禹羌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 李德书



“石纽”二字传为扬雄所书，现存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镇石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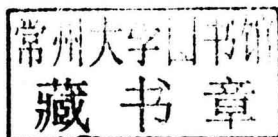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全国第一二届禹羌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QUANGUO DIYIERJIE YU QIANG WEN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主编 / 李德书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国第一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李德

书主编.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47-3834-1

I. ①全… II. ①李… III. ①禹—人物研究—文集②

羌族—文化—文集 IV. ①K827=1②K2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9293 号

全国第一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李德书

出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谢应成

责任编辑: 谢应成

主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绵阳西科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 mm×285 mm 印张 19.5 字数 5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7-3834-1

定价: 5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编 委 会

名誉顾问	李学勤	宋镇豪	宫长为	
顾 问	李后强	龙显昭	谭继和	林 向
	赖 俊	瞿永安		
主 任	冉光荣	詹文都		
副 主 任	李德书	段 渝	彭邦本	谢元鲁
	周福兰	李 东		
委 员	胡 毅	许 强	平文艺	张 彦
	咎宝毅	林 川	郭志武	赵兴武
	朱 静			
主 编	李德书			
副 主 编	赵兴武			
责 编	朱 静			
校 对	尧一三	唐建国	孙芙蓉	

前 言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意义。禹羌文化这个学术概念,是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李德书在2002年4月与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领导和学者到山东禹城开会回来以后根据《史记》“禹兴于西羌”提出来的,并于当年11月策划举办了“全国首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2003年5月由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禹羌文化研究论文集》(李德书、陈开平主编)。禹羌文化这个学术概念提出以后,先是得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认可,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设立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然后得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的肯定,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设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2006年7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了“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7月由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德书、谢兴鹏主编)。2009年4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了“首届中国禹羌文化论坛”。2011年11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禹羌文化论坛”。2013年10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了“全国第三届禹羌文化学术交流会”,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包括台湾学者的认同和支持。2015年7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禹羌文化论坛”。

《全国第三届禹羌文化学术交流会论文选集》(李德书主编)于2015年7月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禹羌文化学术研究的一大成果。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大禹精神,推进禹羌文化研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将2003年编印的《禹羌文化研究论文集》和2007年编印的《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编为《全国第一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分为上下卷),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保持禹羌文化研究的连续性,充分展示全国禹羌文化学术研究成果。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本书中提供论文的台湾学者孙雄先生和大陆学者李绍明先生、谢兴鹏先生、杨光成先生、李先登先生、孟世凯先生,或因病,或遇车祸,或因地震灾害,不幸去世。他们对全国禹羌文化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越秀北川大禹文化基金的全额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委会

2016年5月

目 录

上卷 全国第一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研究历史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代序)	孟世凯(3)
由《夔公盃》铭文说到大禹治水及其相关问题	宫长为(6)
戎禹史源	冯广宏(12)
从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看羌区远古文化脉络	李绍明(16)
三星堆:华夏祭祀中心	刘尚勇(18)
《尚书》所载有关铁与禹贡篇著作年代的探讨	孙 雄(31)
从大禹到李冰:我国传统水利理念初探	
——以古蜀治水史迹及其影响为中心	彭邦本(40)
禹羌文化的核心是水文化	余国成 何 斌(48)
古羌、蜀先进文明锻造的瑰宝:都江堰工程	
——兼论其在荣阳汴渠引河水利工程修建中的指导作用	周述椿(53)
初论“大禹治水”与治水社会形态的联系	郭晓鹰(57)
夏禹与华夏民族	钟利戡 南治平(60)
大禹的民本思想	曹尧德(63)
大禹精神的现实意义	姒承家(67)
禹迹茫茫遍九州	曹尧德(76)
禹生石纽 信而有征	李先登(81)
北川禹羌文化与旅游开发简论	冉光荣(83)
北川文化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蒋 志(86)
办好禹羌“三会” 发展大禹故里民俗文化旅游	李德书(92)
打造大禹品牌 发展北川旅游	谢兴鹏(94)
后 记	(98)

下卷 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代序)	李学勤(101)
禹生石纽在北川	
——大禹故里北川羌族自治县倾力打造禹羌文化品牌纪实	何玉文(104)
禹生之地在北川	谢兴鹏(110)
禹生石纽与大禹文化研究	李德书(118)
由一个假设所引发的争议	
——读《顾颉刚年谱》札记之一	宫长为(126)
论北川禹羌文化是华夏文明之正传	龙显昭(133)
“羊首龙”与“禹兴于西羌”	
——三星堆出土的“羊首龙”与“神坛怪兽”解析	林 向(142)
从东汉景云碑看巴蜀古史新证	李德书(146)
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	段 渝(149)
杜宇是大禹的后裔	孙亚樵 胡昌钰(158)
从宝墩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看大禹和禹羌文化	吴大德 何文虎(162)
论华夏与羌族及川西北大禹故里的关系	杨东晨(168)
炎帝与羌·禹	
——兼谈姜炎文化与羌禹文化	霍彦儒(176)
华夏王国的滥觞	
——浅谈大禹立国的基础	曾宪松(181)
漫谈大禹、大禹治水与巴蜀文明	谢兴鹏(184)
漫谈姜炎文化·巴蜀文化·夏禹文化	谢兴鹏(189)
治水传说与大禹的治水科学	周述椿(193)
大禹文化:城市文明建设的灵魂	谢兴鹏(201)
四川姒族的考查	姒承家(206)
大禹宗族二百二十姓	夏明显(216)
由《山海经》探求禹迹	冯广宏(223)
禹会村考古调查新证	徐大立(228)
《尚书》所载的大禹	王定璋(232)
鲧遭贬殛原由考	李养民(237)
夏羌文化简论	杨光成(243)
谈大禹研究的发展及方向	禹树森(247)

石泉禹王宫考	李佩今(249)
什邡有关大禹和李冰治水的传说考	范小平(253)
试论大禹精神	曹尧德(255)
大禹治水 功在千秋	黄剑华(258)
浅谈大禹思想与反腐倡廉	姚德华(261)
泌阳人民心向大禹	禹殿东 禹宗本 禹明甫(264)
禹羌文化与旅游	蒋 志(266)
论对绍兴大禹文化的产业化开发	张钧德(272)
震撼世界的悲壮举动	张善云(279)
理县桃坪羌乡历史文化三题	李绍明(282)
论四川西北部的羌族及其演变	杨东晨(287)
北川羌族源流考	钟剩戡 南治平(293)
天籁之音:羌族多声部民歌	张翔里(297)
一副联文与徽识的解读	周礼富(301)
后 记	(303)

全国第一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

2003 年 5 月

编委会成员名单

顾 问	聂荣贵	朱登铨	孟世凯	
主 任	冉光荣			
副主任	周礼成	蔡世勤	廖世孔	邱文德
	马敬洪	蹇洪秀	王景福	
委 员	刘文榜	李承霜	陈明世	王成贤
	李德书	经大忠	陈开平	杨永忠
	南治平			
主 编	李德书	陈开平		
副主编	赵兴武	王泽元	谢兴鹏	

研究历史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代序)

◆ 孟世凯

在我国夏、商、周三代史的研究中,夏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原因是古文献有关夏代记载的资料太少。除《史记·夏本纪》的系统记述外,其他都较为零散。商史的情形最初也和夏史相似,自清光绪末年在“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总计出土了近10万片有字甲骨,其后又有少量出土。甲骨卜辞和记事刻辞都是商王朝后半期的遗文,卜辞虽是祭祀时占卜的记录,但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些比古文献中记述商代史既多又全面的第一手史料,运用在商史研究上就可以解决不少的具体问题。夏史的研究就缺乏这样的史料,虽然夏文化的考古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到目前尚未发现可靠的夏代文字。因此,目前对夏史的研究仍是以古文献中的资料和传说为主,同时以夏文化考古发掘的资料来参证探讨。

古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的记述多有不同,尤其是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就给研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也不要因此妨碍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当继承、发扬祖先们的优良传统和创业精神。

大禹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之一,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奠基者,是伟大的抗洪、治水英雄。东周时周景王命刘定公去颖慰劳赵孟,刘定公在洛水边说“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大禹,我辈岂不成鱼类了吗?)这句话代表春秋时期人民的心声,也代表了后代中华儿女的心声。大禹在抗洪、治水平土过程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民的伟大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财富。四千年后,21世纪的中华儿女生活在现代高科技的信息时代,社会生活都以快速节奏在运转。我们在新时代享受现代化的一切物质文明的时候,也不应忘却在“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继承、发扬这种民族精神,只有如此才不愧对我们的老祖宗。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讲史、传史的传统,最早的时代是由巫师们讲述神人间之事,后来就是由氏族长(许多都是巫师)讲述祖宗的历史,而且是世代相传。到有文字的时代,就由口耳相授发展为用文字记录,这些记录就是历史资料。进入王朝时期记录朝中大事和国王言行的人称为史官。《礼记·玉藻》载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西周时称为“大(太)史”和“内史”,史官记录就是史书。夏、商、周都应当有王朝的史书,但是现在所知最早的只是春秋时东周和各诸侯国的史书。当时周王已是名誉上的共主,与诸侯同等,所以周也作为一国有史书。这些各国史书因是系年编撰,故取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秋二字作书名。《墨子·明鬼下》载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孟子·离娄

下》也说：“晋之《乘》，楚之《涛机》，鲁之《春秋》，一也。”可知《乘》、《涛机》是晋、楚史书的别名。所谓《左传》，就是作者根据“百国《春秋》”给《鲁春秋》作传。西汉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开我国“通史”之先。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此后历朝不断，至清朝乾隆四年（1739）御定二十四部为“正史”，私家不得增改。

除官修史书外，还有大量私家的著述，即地方史、志。先秦时期，史、志无多大区别。《周礼·地官·诵训》所谓：“掌道方志，以昭观事。”郑玄注：“说四方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孙贻让《正义》：“此并四方久远之事，若后世地志所谓古迹，《诵训》所道亦其类也。”又《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书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于鲁，观书大史氏。”可知“志”是记载四方久远的事或邦国的史书。秦汉时期已出现偏重于记述某一地方的地理、风土、人情的志书。东汉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十二卷，是后世方志的雏形。南北朝至隋唐时的志书多为分类，北宋太宗时的史乐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即参照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的分类，又增加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四夷等，其后历朝的志书皆参照此模式编纂。

方志与地方史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大体来说方志所收范围广，门类多。但是两者所收的资料有许多是正史所不及的，正是这些历朝历代的史、志，才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而流传于后世。现代用地方史是沿用历史上的名称，如果只用于近代的市县来说也可行。但是今天的某市、县是现在行政区划的概念，古代的州、郡、县所辖范围比现在的要大。而且编写地方历史文化都要溯源，大多都追寻至先秦或秦汉时期，如楚、秦、齐、晋、吴、越、巴、蜀等，都要跨越省、市、县，故我一直主张用“区域历史文化”之称才较为全面。自20世纪末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给学术界创造了宽松的大气候，传统的“稷下学风”重起，“双百方针”得以逐渐真正执行。曾经束缚古史学界的“长官指示”“阶级斗争为纲”“厚今薄古”等，日益被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许多地方恢复了停滞20余年的地方志或史志办公室，并重新启动编纂工作。1980年筹备，次年8月成立的“中国地方志协会”，是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提倡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来编修地方史、志。20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建立的“地方志小组”，也于1983年4月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开展工作，到80年代中期，各种地方史、志由一卷本至多卷本陆续出版，有的地、州、市还出了分类志。

在上述大环境中和地方编修出版史、志的推动下，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也紧随其后。其特点是全面展开，以先秦国家为主体的楚、秦、晋、齐、鲁、吴越、巴蜀、赵、荆、杞、吕、许等历史文化，以古帝王为主体的黄帝、炎帝、蚩尤、大禹、皋陶等的历史文化，以古代著名将相、著名文人为主体的历史文化纷纷开展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始升温，根据当地史、志中的记载，对该地是古代某个王朝、诸侯曾建或迁都的古都邑，某位古代名人的生或葬地，自行或与高校、研究单位、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探讨该地历史文化的源流、历史与现实意义。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势发展的必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当地领导意识到开发、利用历史文化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投入有限的费用，邀请专门从事我国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这种优势互补的研究方式，实践表明具有良好的效果。从研究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来说，能发现不少的史料供正史研究，纠正过去对区域历史文化的偏见；从地方建设来说，可促进旅游事业加速发展。因我国是个生态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厚的大国，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的旅游业发展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末自然景观已不能满足游者。我国几千年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分布在各地区，游者不仅要看长城、故宫和佛教在我国的遗存，还要求具有更深层次、内涵的历史文化。加之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寻根问祖热；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开发、建设等,都与当地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有密切关系。如果成功,就能为当地招商、引资开辟出一条捷径。当然,在开发、利用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时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作学术上的充分研究,切忌那种“长官意志”“外行领导内行”等既无社会效果,又将贻笑后世之事发生。

北川县对大禹文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1987年以来,在绵阳市和北川县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搜集有关大禹的文献资料编印了《禹生北川》,出版了《大禹史料汇集》等书。考察了传说大禹在茂县、汶川、北川的遗迹,将大禹出生地定位于北川,对“禹穴沟”“石纽”等进行开发建设,又建了一座“大禹纪念馆”。1991年,还成立了“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其后召开过省内和全国性的“大禹及夏文化研讨会”,出版了《大禹及夏文化研究》论文集。我有幸参加了1992年7月在北川县召开的“大禹及夏文化研讨会”,并协助请我们研究所的杨向奎先生为论文集题写了书名。之后因忙于其他地方的学术研讨会,对北川县大禹及夏文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只是从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四川的成员中了解一些。2002年4月下旬,中国先秦史学会与禹城市人民政府联合在山东禹城召开“全国首届禹城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北川的代表们才告知十多年来,他们在大禹文化方面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可敬可佩!

关于大禹和夏文化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大体上形成“以四川省北川县为中心的大禹出生地,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的大禹活动地,治水涉及黄河中下游,影响于江淮流域,大会诸侯于安徽怀远县之涂山,葬地在浙江绍兴”的新动向。当然,学者中并不完全有此共识,此亦很正常。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影响所及,传说的遗迹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我一贯主张,并在不少的学术研讨会上讲过:“先祖大家祭”。只要不是从意气出发去争什么“正宗”,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共同来全方位、多视角地研究,又有何不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由《癸公盨铭文说到大禹治水及其相关问题

◇ 宫长为

大家都知道,夏商周三代历史久远,文献古奥,多有阙如,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20 世纪初,随着殷墟甲骨文、汉简以及敦煌文书的三大发现与研究,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特别是经过一代宗师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的不懈努力,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原则,即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①,不仅确认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而且还直接引领我们走进新史学的时代,诚如郭老所言:“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决非过论。”^②

但是,我们也无须讳言,由于夏代考古工作相对滞后,以至于我们迄今仍不能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这里主要是文字材料,来印证《史记·夏本纪》的可信性。尽管有传世的金文材料,也只限于春秋时期的《齐侯镈》《钟》及《秦公篇》这两例,都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最近,由保利艺术博物馆新购的一件青铜器,名曰《癸公盨》(如图 1 所示)。无论从器形上看,还是从铭文的字体上看,都属于西周中期偏晚,内容涉及大禹治水有关事迹,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更早的例证,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纵观全铭,共十行九十八字(如图 2 所示)。现依李学勤老师的考证^③,且仍用通行字与假借字,抄录如下:



除锈前的癸公盨



除锈后的癸公盨

图 1



图 2 癸公盨铭文拓本

① 见王国维:《古史证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2 页。

② 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9 月,第 194 页。

③ 见李学勤:《论癸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一文,刊《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 6 期。

“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阙贵唯德。民好明德，顾在天下。用阙绍好，益于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天庋。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考，审复用祿，永御于珉。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侮。”

这里，我们应当指出，这篇铭文如同一篇《尚书》一样，显得十分珍贵。如，比较而言之，有两个不同点：一是时间上已经接近于西周中叶；二是内容上专门阐述大禹的功德，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解读传世的古文献，重新认识夏代的历史。

从传世的古文献记载来看，有关大禹治水的事迹，见于较早的《诗》《书》，以及《左传》《国语》《诸子百家》，包括秦汉以来的典籍。值得注意的是，《燹公盨》铭文开头一段，“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基本上与传世的古文献相吻合。比如《尚书·禹贡》篇开头即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虽然没有“天命”二字，但是“禹敷土”三字，则确认无疑。铭文“敷”本作“專”，古书作“敷”，一作“溥”，“敷”与“溥”通，皆从“專”声^①，当训为“布”，音训亦通^②。郑注：“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③也就是说，“禹敷土”，乃为“别九州”或“定九州”“均定九州”之意^④。又比如《书序》亦云：“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其中的“随山濬川”一句，完全与铭文一致。只是“随”字，铭文作“𨾏”形，可以隶定为“隆”“𨾏”或“陸”字，诸家解释有所不同^⑤。我们根据李学勤老师的意见，盨铭第一行的“隆”字，右半从二“又”二“土”，正确释读的线索，是在研究新出战国竹简时找到的，字之为“随”，断可无疑。至于“濬”字，铭文本作“𨾏”形，隶定为“叡”字，当是“濬”字的初文^⑥，《说文》谓：“深通川也”。也就是说，“随山濬川”，即顺应山势，疏通河川之义。

有趣的是，我们讨论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尚书·禹贡》篇，一个是《尚书·禹贡》篇的《书序》，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质上还涉及一个具体的成书年代问题。按照通常的说法，《尚书·禹贡》篇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战国末期；而《尚书·禹贡》篇的《书序》的定型，则大概是西汉后期的事情了。现在看来，《燹公盨》铭文的出现，与传世的古文献若合符节。起码可以说，《尚书·禹贡》篇的制作，肯定不会是战国时代，而《尚书·禹贡》篇的《书序》的初本，我们仍坚持史迁的意见，“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⑦，当然是由孔子所作。如是说来，全部《尚书》的成书年代，亦当在春秋以前了。

其实，我们考证大禹治水有关事迹，包括整个夏代的历史，乃至全部上古史在内，有一个对传世的古文献的认识问题。“信书”也罢，“疑书”也罢，历史毕竟是客观上存在的事实。如果我们什么都要等到“地下之新材料”的出现，才能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那么我们最好什么都不要研究了，耐心地等待下去好了。不要以为甲骨、金文材料有的，则信；无之，则否，这不是我们研究古史应有的态度。

① 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

② 见李学勤：《论燹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一文。

③ 见《尚书正义》卷一。

④ 见《书序》《山海经·海内经》等。

⑤ 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上的相关文章。

⑥ 见裘锡圭：《燹公盨铭文考释》一文，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⑦ 见《史记·孔子世家》。

我们赞成这样的一种意见,研究古史,必须文献、实物并重,且以文献为主^①。文献即“纸上之材料”,是先贤留给我们的文字信息。实物即“地下之新材料”,是考古带给我们的物质信息,物质信息有赖于文字信息的阐明;文字信息有赖于物质信息的印证。两者在古史研究中,由于它们的性质和作用不同,从而决定了它们的地位和价值。

当年,王国维作《古史新证》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古史研究中的两种弊端,时至今日,仍具有启发意义。为此,我们不妨再移录如下: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免、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②

所谓“信古之过”,所谓“疑古之过”,在我们看来,问题恰恰在于古史研究的态度上。具体地讲,就是如何摆正文献与实物的关系,换句话说,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关系。在这里,“信古”或者“信书”,“疑古”或者“疑书”,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主张,应当以《夔公盨》铭文的发现为契机,有必要对古史研究,特别是夏史研究,作以反思。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澄清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大禹是人,不是神,大禹治水是信史,不是传说。

这一点,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读《史记·五帝本纪》卷末“太史公曰”的话,就不难发现个中原委。其云: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学家,不但勇于探索,“择其言尤雅者”,著《五帝本纪》于“书首”,而且还能够“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考查古迹,且“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求实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说是令人信服的。那么,五帝以降,下启夏商周三代,以《夏本纪》为卷二,《殷本纪》《周本纪》相依为次,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难怪王国维先生通过甲骨卜辞中所见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的考证,以为“《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

① 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序》一文,刊《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又收入《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

② 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第1~2页。

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①

其次,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讨论大禹治水问题,客观地说,它实际上促成了华夏一统的天下格局。

从世界上古史的角度来看,最初国家的产生,都是小邦小国,统一大帝国是后来的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起来的。”^②古代中国的情形,恐怕也只能如此。

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到了龙山文化的中晚期,也就是夏王朝统一的前夕,已经显露出文明时代的曙光。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包括其他的周边地区在内,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三要素,即城址、青铜器和文字,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相继发掘了安阳后冈、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鄆城郝家台和辉县孟庄等多座古城遗址。尽管其规模小、人口少,但是布局合理、结构严谨^③,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呈现给我们邦国林立的画面^④。因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大禹治水,同时也正是通过治水途径,采用了“以四海为壑”的新办法^⑤,赢得了各邦国诸侯的普遍认同,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⑥,正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其间“苗顽弗即工”^⑦,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战国策·魏策二》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它反映了两个事实:第一,禹征有苗,不仅依靠华夏族,也有非华夏族参加;第二,东夷没有参加联军,因为东夷和三苗是“婚姻”,而与华夏为“仇国”^⑧。禹征有苗的胜利,奠定了华夏一统天下的基础,随后“芒芒禹迹,画为九州”^⑨,分为四正四隅,加上中央为块,且按照各州的不同土地,实施“任土作贡”,从而结束了邦国林立的局面,最终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夏王朝,开创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

再次,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大禹,他由一个邦国之君转变为天下之王。

在《尚书·尧典》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自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现摘录如下: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

金曰:‘伯禹作司空。’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

帝曰:‘俞,汝往哉!’”

其义大致意思,主要是舜征询四岳的意见,如何选官任能,四岳都说“伯禹作司空”,帝舜非常赞成,就命禹去做平治水土的工作,而禹则再三谦让,最后,帝舜乃命曰:“汝往哉!”即你去干吧!

在这段简短的对话当中,给我们透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大禹又称“伯禹”,这个“伯禹”之

① 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页。

② 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48页。

③ 见马世之:《中原龙山文化城址与华夏文明的形成》一文,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一书,中华书局1996年9月。

④ 见许顺湛:《再论夏王朝前夕的社会形态》一文,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一书。

⑤ 见《孟子·告子下》。

⑥ 见《左传》哀公七年。

⑦ 见《尚书·皋陶谟》。

⑧ 见金景芳:《禹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一文,刊《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奴隶社会史》第一章第一节。

⑨ 见《左传》襄公四年。